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推敲“进步”话语

——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

◎ 殷企平 著



商務印書館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推敲“进步”话语

——新型小说在 19 世纪的英国

殷企平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 19 世纪的英国/殷企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ISBN 978-7-100-06746-1

I. 推… II. 殷… III. 小说—文学研究—英国—19 世纪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98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推敲“进步”话语

——**新型小说在 19 世纪的英国**

殷企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746-1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35.00 元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总序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开明人士的共识。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会同浙江巡抚和地方士绅，积极筹备开设一所以西方科学体系为主要课程的新型学堂。经清廷批复，求是书院于1897年3月在杭州设立（1901年改为浙江大学堂）。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所新型高等学府之一。

求是书院几经变迁，到1928年，成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杰出的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1890—1974）出任校长，广揽英才，锐意改革，很快使浙江大学实力大增，名满东南。抗日战争期间，全校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艰苦跋涉，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一时名师云集，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家辈出。1928年，浙大正式设立文理学院，开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心理学、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1936年增设史地学系，1939年，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1945年成立法学院，后又陆续增加哲学系、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等系科和一批文科类研究所。与求是书院同年创建的杭州育英书院，1914年成为之江大学。陈独秀、蔡元培、陈望道、胡适、蒋梦麟、马叙伦、马一浮、郁达夫、夏衍、吴晗、胡乔木、施蛰存、郭绍虞、林汉达、经亨颐、汤用彤、谭其骧、劳乃

宣、邵裴子、宋恕、蒋方震、许寿裳、沈尹默、邵飘萍、梅光迪、钱穆、马寅初、张荫麟、张其昀、贺昌群、钱基博、张相、夏承焘、姜亮夫、朱生豪、王季思、严群、许国璋、王佐良、薄冰、方重、裘克安、戚叔含、李浩培、孟宪承、郑晓沧等著名学者曾在这两所学校学习或任教。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一度变为以工科为主的高等学府。它的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后演变为杭州大学。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则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98 年 9 月，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新时期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新浙大是目前国内学科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之一。

新浙江大学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目前，浙江大学拥有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一级学科，门类齐全，实力雄厚。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方面，浙江大学更具有明显优势。为了有力推动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世纪之初，学校确立了“强所、精品、名师”的文科发展战略，从机构、成果、队伍三方面加强建设，齐头并进。《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系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历史与未来，社会与人生，中国与世界，旧学与新知，继承与创新……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趋势

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重要性正日益凸现,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必将以独立的思考,来回应社会、时代提出的问题。编辑这套《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正是为了记录探索的轨迹,采撷思想的花朵。

浙江素称文化之邦,人文荟萃,学脉绵长。自东汉以来,先后出现过王充、王羲之、沈括、陈亮、叶适、王守仁、黄宗羲、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南宋后更形成了“浙江学派”,具有富于批判精神、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鲜明学术传统。浙江大学得地灵人杰之利,在百年发展史上集聚和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也形成了自己“求是创新”的优良学风。《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将以探索真理、关注社会历史人生为宗旨,继承优良传统,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新知趋邃密,旧学转深沉。既推崇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创新之作,也欢迎沉潜精严的专题研究著作,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同生共存,融会交叉,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是一套开放式的丛书,主要收纳浙江大学学者独立或为主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为了反映浙大优良的学术传统,做好学术积累,本丛书出版之初将适当收入一些早年出版、在学界已有定评的优秀著作,但更多的位置将留给研究新著。为保证学术质量,凡收入本丛书者,都经过校内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精品”是我们倡导的方针和努力的目标,是否名实相符,真诚期待学界的检阅和评判。

同样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向以文化积累和学术建设为己任,盛期曾步入世界出版业的前列,而今仍是在海内外享的盛誉的学术出版重镇。浙江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有着悠久的历

史。早在 1934 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国立浙江大学丛书》。值得一提的是,浙大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一是高梦旦(1870—1936),他 1901 年任刚刚更名的浙江大学堂总教习,次年以留学监督身份率留学生赴日本考察学习。1903 年冬他应张元济之邀到商务,与商务共命运达三十余年,曾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倡议成立辞典部,创意编纂《新词典》和《辞源》,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老校长竺可桢,他 1925—1926 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主持工作,参加了百科词典的编写。在浙江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百年浙大和百年商务二度携手,再续前缘,合作出版《浙大学术精品文丛》,集中展示浙大学人的研究成果。薪火相继,学林重光,愿这套“文丛”伴随新世纪的脚步,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率先推敲“进步”的迪斯累里	31
一、用小说书写历史	
二、进步的异化	
三、两个民族和一种冲动	
第二章 《董贝父子》：水盆还是花瓶？	53
一、铁路意象	
二、是《董贝父子》，还是《董贝父女》？	
第三章 《艰难时世》的艰难历程	79
一、对“数字化生活”的批判	
二、书中的所谓“败笔”	
第四章 《小杜丽》中的“进步”瘟疫	103
一、方法即体验	
二、是进步？还是瘟疫？	
三、骗子成群	
四、对比和反差	
第五章 “进步”车轮之下	
——《玛丽·巴顿》的意义	131

一、“两个民族”之痛

二、不是政治经济学，胜过政治经济学

三、约翰看橱窗

第六章 “进步”浪潮中的商品泡沫

——《名利场》的启示 153

一、对“进步”话语的质疑

二、商品文化的侵蚀

第七章 体面的进步

——《纽克姆一家》昭示的历史 177

一、工业幽灵与新的“进步”

二、“进步”得体面 体面地“进步”

三、虚虚实实写历史

第八章 “成功”道路上的“钻石风波”

——《尤斯蒂斯钻石》的警示 205

一、商品文化和“成功”语境

二、现实丑与艺术美

第九章 以“不安”为特征的情感结构

——解读《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231

一、“欲踢又止”为哪般？

二、商业价值观侵入人类精神领域

三、是平静的世界？还是动荡的世界？

四、麦尔墨特的败因

第十章 《谢莉》：“进步”话语的解构和“通天塔”意象的建构 255

一、贯穿始终的质疑基调	
二、巴比伦通天塔:时代的话语特征	
第十一章 《奥尔顿·洛克》:对“机械时代”的回应 ...	281
一、金斯利和他的时代	
二、回应“机械时代”	
三、叩问自由	
四、错把信仰作外衣:毒瘤似的自由	
第十二章 《亚当·比德》:过去是一面镜子	305
一、用过去这面镜子照现在	
二、两种人物和两种时间	
第十三章 《激进党人菲利克斯·霍尔特》:对速度的 忧虑	335
一、更大的主题:文明进程的速度	
二、对“速度”的反拨	
第十四章 “鬼魂”·互文·历史 ——从《米德尔马契》看“进步”话语	361
一、米勒召唤的“鬼魂”	
二、再写“鬼魂章节”	
三、历史的幽灵	
第十五章 《无名的裘德》:铁路时间与异化主题	389
一、“小时光老人”和铁路时间	
二、“进步”和异化	
第十六章 吉辛对“进步”话语的挑战 ——《文苑外史》中“列车”的含义	417

一、“列车”意象的情景语境

二、“列车”意象的社会文化语境

第十七章 康拉德和他的《进步前哨》..... 439

一、作品的主题

二、怎样评价马可拉？

三、凯亦兹的死因

第十八章 余波未定 457

一、《虹》与“进步”浪潮

二、哀莫大于心死：伊丽莎白·鲍温的推敲

三、约翰·韦恩对“进步”的回应

四、斯威夫特的“进步模式”

五、被鸚鵡嘲弄的“进步”

六、《下一个》中的“进步”

结 语 499

主要参考文献..... 509

索 引 528

后 记 536

前 言

本书是对黄梅博士《推敲“自我”——小说在 18 世纪的英国》一书的呼应。

我国的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在新世纪出现了一种可喜的新气象,即把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作为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出发点和指归。在这一新气象中引领潮流的有陆建德博士的《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2001)、阮炜博士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2001)和丁宏为博士的《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2002)。黄梅博士的力作是这一新气象的又一个标志。这些著作都可以用陆建德赞扬黄梅的一句话来形容:作者们时时处处显示出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并老练地将这种关怀自然融入全书,读了有‘撒盐于水,化于无形’之感”。^①

如黄梅博士所说,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国学术界有关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英国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失衡现象:探讨在“强国之路”上的英国政治体制、科技振兴计划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大型丛书频频问世,而关注同一时期英国人切身感受到的困惑、痛苦以及种种思想危机和情感危机这一方面的作品却如凤毛麟角。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当然有必要参照当

^① 见《推敲“自我”——小说在 18 世纪的英国》封底,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年英国在经济腾飞道路上的诸多经验,但是更有必要聆听许多英国有识之士在快速发展的漩涡中所发出的心声。聆听这种心声的最好场所莫过于在相应时代写就的小说——恰如怀特海所说,“如果我们希望发现某代人的内心思想,我们必须求助于文学”;¹ 由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文学舞台上公认的主角是小说,因此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小说是顺理成章的。

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是在 18 世纪,达到高潮则是在 19 世纪。本书聚焦的对象是 19 世纪的英国小说,这不妨看作是对黄梅博士所做工作的一种延续:笔者所选择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而行文过程跟黄梅的一样,“特别注重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它们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² 从某种意义上说,19 世纪的英国比 18 世纪的英国更加具有“转型”的特点,因为只是到了 19 世纪,人们的普遍意识里才形成了“社会转型”这一概念。霍顿(Walter E. Houghton)对此有过确切的说明:

这一时代(笔者按:指维多利亚时代)唯一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是一种共识,即“我们生活在转型时期”。这是当时几乎普遍存在的基本概念,而且是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概念。虽然所有时代都是过渡时期,但是此前人们从未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作一个由过去向未来转型的时代。在英国,这种意识确实是跟维多利亚时代同步开始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 1831 年发现,社会转型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人类进步得太快,以致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可是人类又还没来得及掌握新体制和新学说。”穆勒同时还注意

到,这一特征“在几年前”只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辨别,而如今“即使最没有观察力的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一特征”。³

这一段历史就像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中所唱的那样,“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然而,再暗淡的历史也是当代史,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⁴更何况在这暗淡之中还蛰伏着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关当代中国文化的利害的一些紧迫问题。

黄梅博士在她的书中认同了瓦特(Ian Watt, 1917—)的一个著名观点,即有关个体“自我”的想象和思考是18世纪小说的一个根本关注。她在“余语”部分还提到了瓦特对“现代进步”的忧惧。“现代进步”和“个人主义神话”是两个密切相关的话题。不过,如果说18世纪的英国小说把侧重点放在了对“自我”的推敲上,那么19世纪英国小说的最强音则是对“进步”的推敲。

虽然英国在19世纪以前就已经目睹了“飞梭”的发明、“珍妮纺纱机”的创制、水力纺纱机的研制、动力织布机的出现、蒸汽机的问世等一次次显赫的工业成就和物质进步,而且关于科技进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科学推进论》(*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和《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 1610)^①,但是带有“速度”含义的“进步”这一

① 根据伯瑞(John Bagnell Bury, 1861—1927)的考证,人类历史上进步这一观念始自两个人的阐释工作,即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的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对人类发展史所做的描述、解释和预言。虽然培根和伯丁“均未发现进步这一观念”,但是他们的思想贡献“都对这一观念的随后出现起到过直接的作用”。见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页。

概念是在19世纪开始普遍流行的。霍顿曾经作过这样的述评：“直到维多利亚时期之前，动力和通讯方面的速度几乎保持了几百年不变。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陆地旅行的速度就从每小时12英里提高到了每小时50英里（增长到百分之四百以上）……给维多利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新发明的机械速度，不如说是这些发明在生活方面带来的速度变化。”⁵更确切地说，“速度新概念”的形成直接跟火车/铁路的崛起有关。铁路不仅改变了英国社会，而且“改变了时间和空间概念，过去时间以天为单位，现在以分钟、以秒计算；过去一两百英里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现在则只是近在咫尺。人们突然感到空间和时间都缩小了，于是生活的节奏也就加快……时间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概念。”⁶关于这一点，阿尔梯克(Richard D. Altick)有过更明白的解说：“铁路使速度这一概念渗入了全民意识。在这一方面，铁路所起的作用超过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任何科技发明。”⁷

跟速度意识同时蔓延的是有关“进步”的宏大叙述。虽然在19世纪之前就出现了一些有关“进步”的思想观念（除了前文所说的培根之外，18世纪的亚当·斯密就“非常有效地对人类集体进步说做出了贡献”⁸），但是“进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似乎是19世纪的事情——当时的英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度都痴迷于一种宏伟的构想，即人类社会因财富的无限增长而无止境地朝着幸福状态进步。为这一宏伟蓝图摇旗呐喊的有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①(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和莫利(John Morley, 1838—1923)等一大批人,其中又以麦考莱及其豪言壮语最有市场——根据霍顿的记载,麦考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⁹从1849年至1861年,他那长达5卷的《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在书市一直走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录:该书“1849年出版第1卷和第2卷,获得空前的成功……185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的第3卷和第4卷问世,立即成为畅销书”。¹⁰该书和他的另外许多文章一样,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英国历史是一部值得强调的进步史”。¹¹麦考莱豪气干云,干脆宣布英格兰已经进化成了“最伟大的民族”:

(英格兰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高度文明的民族。英格兰人的版图已经遍及全球……他们的海军力量足以在一刻钟内同时消灭来自北欧、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军。他们把治病救人的科学、交通和通讯手段、各类机械技术、各门制造业、各种能够给生活带来便利的东西都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我们的祖先若地下有灵,定会叹为观止。¹²

麦考莱及其追随者描绘的“进步”神话代表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

^① 穆勒早期受边沁和父亲詹姆斯·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但他在后期对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进步”神话有过反思和批判。

话语，他们对现实的解释代表了官方的解释，他们笔下的历史是披戴着权威光环的“正史”。

当然，人类追求进步和幸福，这本身无可厚非。如哈罗德·坦普利所说，“进步的观念非常有用”，¹³因为它“冲击了对恶性循环或满足于现状的信念”。¹⁴不过，把进步视为简单的科学定律，那就产生许多问题。就连以《进步的观念》一书而闻名于世的伯瑞也清楚地意识到“进步的观念中纠缠着很多其他棘手的问题”，因而“他决不是愉快的乐观主义者，并非随时准备为每一个统计的结果欢呼喝彩”。¹⁵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愉快的乐观主义者”。罗伯特·路威(Robert Heinrich Lowie)就曾经持批判态度地谈到，人类社会中存在一种“认进步为不绝的和必然的事情之信仰”。¹⁶就 19 世纪而言，这种信仰在英国流传最广，扎根最深，在英国资产阶级中尤其如此。根据摩顿(A. L. Morton)的记载，飞速发展的“铁路时代”“对英国资本家来说是好时代。他们把自己的好运气看作自然规律，并且认为这种好运气会永远延续下去”。¹⁷这无疑是一种令无数“进步分子”陶醉的进步观。

确实，与工业革命相伴而行的“进步”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到了 1870 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在其他国家之上：它的工业生产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铁和煤的产量占世界的二分之一，贸易总额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英国商船的吨位高居各国首位。伦敦成为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¹⁸

然而，发热的进步速度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

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于 1856 年 4 月 14 日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曾经作出过下列回答：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